

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任务。

到红五军团后，陈云发现问题比他预先估计的还要复杂得多。长征刚开始时，采取的是“搬家式”的行军方式，红五军团要把兵工厂、印钞厂、印刷厂的各种重型机器全部带上，行军速度相当缓慢，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。如此状态的一万人军团要应对从多方快速夹击的十几万敌人，战斗格外艰苦惨烈，伤亡很大。此外，如此不顾实际的行军方式还造成了战士不满，有人当了逃兵或者投敌。

陈云为了稳住部队，一方面做思想政治工作，帮助大家树立信心；另一方面，直接向中央反映，提出应该把笨重的机器就地掩埋或者抛弃，这样红五军团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断后的任务。当时，“左”倾思想统治下，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，动不动就会被扣上右倾的帽子，被打成反革命，有的甚至被杀害。陈云敢于这样行动，有很大的勇气。在他的不断坚持下，最终红五军团得以轻装上阵，战斗力明显增强，打了几次胜仗后，士气鼓舞，部队稳住了。

陈云带领红五军团，先后完成掩护主力红军突破三道敌人封锁线的任务。他回忆当时，“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，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”。

之后，国民党军队在湘江以东投入近30万兵力，自东向西收缩，企图以优势兵力在湘江东岸全歼红军。红军已无退路，必须拼死渡过湘江。红五军团布阵于湘江东岸掩护中央红军主力。1934年12月1日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，西侧敌人已开始急速合拢，而红五军团部分部队仍滞留东岸与敌激战。陈云果断派人给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送了一封信。信中写道：“这是紧急关头，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，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，赶快拉过湘江。”接到命令后，十三师连夜急行军45公里，抢在敌人合拢之前渡过湘江，保存了革命力量。

在此后的长征途中，陈云又多次肩负关键的指挥职责。例如，1935年5月，中央红军在云南禄劝县的皎平渡抢渡金沙江，陈云出任渡河司令部政委，与司令员刘



陈云（左三）同邓小平（左一）等在延安。

伯承共同指挥。他制定严格的渡河纪律，统筹部队渡江秩序，指挥3万余红军依靠6条木船，历时9天9夜全部安全渡过金沙江，未损失一兵一马，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。

促成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

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，陈云全程参与了这次会议，并力促其成功。

湘江之战后，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。毛泽东力主中央红军放弃原定继续北上湘西的计划，改为前往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。经过通道、黎平两次中央会议，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。

陈云因为离中央所在的先头部队有几天的路程，未能参加上述两次会议。在赴遵义途中的团溪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单独约谈陈云，使陈云了解到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由于领导错误而造成的损失。到遵义后，陈云、张闻天受周恩来之邀谈话，陈云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提出的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。

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陈云出席遵义会议。毛